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总第一辑(第一卷第一辑)

◎ 施 旭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总第一辑(第一卷第一辑)

施 旭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总第1辑/施旭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308-06144-6

I. ①当… II. 施… III. 汉语—话语语言学—研究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9077号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总第一辑)

施 旭 主编

责任编辑 王长刚

装帧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18号 邮政编码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171千字

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144-6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主 编

施 旭

浙江大学

编委会成员

曹顺庆

四川大学

陈国明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陈汝东

北京大学

顾曰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 煜

香港浸会大学

李 岩(女)

浙江大学

李战子(女)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刘亚猛

福州师范大学

曲卫国

复旦大学

邵培仁

浙江大学

王 宁

清华大学

文贵良

华东师范大学

汪 琪(女)

台湾政治大学

吴东英(女)

香港理工大学

吴宗杰

浙江大学

徐 岱

浙江大学

尹韵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创刊贺词一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文化转型时代。一方面,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使人与人之间的紧密沟通成为可能;转基因、干细胞、克隆等生物工程技术使生命可能通过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写和优选;而纳米技术使人类能够实现对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这些革命性的新知识、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节,导致人类对时间和空间都有了和过去根本不同的看法,也导致了对地球资源的空前消耗和争夺。人类所面对的现实,不是对抗,就是对话。对抗引向战争和毁灭,对话引向和平。另一方面,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加以德国的反犹太法西斯集中营、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残酷经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这种重新定义只能在全世界各民族的对话中进行。目前,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封闭主义发展而来的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全面战争的前夜。要制止这种冲突,不能通过暴力,只能通过对话。用对话代替对抗,将敌意消融在萌芽状态,是争取和谐、和睦、和解的根本途径。

不同文化对话首先会遇到一个话语问题。平等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话语有如游戏规则,对话时,双方都要遵守某些规则,形成最基本的认同,否则就无法沟通。正如我们不能用下象棋的规则来下围棋一样,规则不同,游戏就无法进行,对话只能终止。在跨文化对话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要形成一种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方,而又能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的用以沟通的话语。西方话语本身经过数百年积累,汇集了千百万智者对人类各种问题的思考,并在与不同文化的交往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抛弃这种话语,对话将难以进行;然而,只用这套话语及其所构成的模式去诠释和截取某种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会因不能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摒除在外。果真如此,所谓对话就只能是同一文化的独白,无非补充了一些异域资料而已,并不能形成真正互动的生成性对话。长此以往,该地区本土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本土话语的发展就会受到压制,以至萎缩。

如何才能走出这一话语的困境?最重要的是要从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出发,寻求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中介”,也就是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从不同文化立场和角度进行讨

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在对话中保持一种平等心态。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其他民族的文明,而是固执地、也许并不带恶意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就是比其他文化优越,应该改变和统率其他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许多过去被压抑的民族,由于十分敏感于捍卫自己固有的文化,以至保守、封闭,拒绝一切对话和更新,结果是自身文化的停滞和衰竭。要改变这种心态,远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如意大利一位研究跨文化文学现象的学者——罗马知识大学的尼兹教授所说,这是一种“苦修”^①。有了平等对话的心态,就有可能寻求一个双方都感兴趣的“中介”,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从不同文化立场和角度来进行讨论。

在这方面,文学可以起特殊的作用。历史证明,所有伟大的文学或艺术作品总是体现着人类经验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读者产生共鸣,同时又是作者本人的个人经验、个人想象与个人言说。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不管作者是否愿意,总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带有不可避免的自身文化的色彩;在被解读时,读者一方面带有自身的文化先见,一方面又因人们对共同经验的感知和理解而突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产生了新的阐释。例如人的生、死、爱、欲等问题是古今人类共同的话题,构成了不同文化的文学对话的基本对象,后人通过这样的文学对话,有同样的领悟,受到同样的启发。事实上,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对共同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鸣响着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同时又受到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人的解读。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互相交往、互相理解,得出共识,形成共同的话语。这绝不是一件简单易行的事,而是一项需要全人类长期投入的伟大工程!

欣闻浙江大学首创《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专刊,意图比较东西方的话语规则,进一步探讨过去东西方学术对话中的话语问题;总结中华传统中语言交际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的基础理论;并研究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的关系以及中国话语面对世界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构想。《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是全球第一份从语言和文化角度去探讨话语问题,并研究当代文化及其与世界关系问题的中国学刊,真是可喜可贺!兴奋之余,写了上面一些话,祝学刊展翅腾飞,前程万里!

乐黛云

^① 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比较文学》,罗恬译,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1期,第5页。

创刊贺词二

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言辞之用大矣！西方哲学之语言转向，亦得此理哉；当代热点之话语研究，亦由此出乎？

当今学问，壁垒分明，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各执一途，何以贯之？曰：话语。盖各门学问皆以话语为用也。当今学术，论之高堂，民生实际，何以系之？曰：话语。盖话语所论，非语词篇章，乃言说之方式，言说之效果也。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经济法律，管理教育，各有其语用，然结合其语境，可见其话语掩映下权利之博弈，为民鼓与呼也。当今世界，多元共存，交流沟通，更赖话语。《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筑台引凤，善莫大焉。

如今，传统话语业已隔膜，西方话语又有隔阂，当代话语杂处各式话语理论之间，不知所从。晚清以降，西学渐炽，千年传统话语，轰然倾塌。天人感应，见嗤以科学；心斋坐忘，无敌于物竞；话语流变之速，人不知何以安。新旧错愕，必除旧以布新；中西交流，皆以西来范中，百年激进，东搬西挪。自俄苏而英美，从尼采至福柯，琳琅满目，邯郸学步。蓦然回首，那人却不在灯火阑珊处！

话语之方式乃思维之方式，话语之建构乃精神之建构。失语失家，语不知何以出，思不知何以进，如何构建知识，如何传承文明，亟待话语之重建。环顾当今之世界，话语之强权仍在，亟待多元之对话。

当代话语之研究，亦当代话语之建构也。一则中国话语中国化，传统之话语复活于当今，为我之根脉也；一则西方话语中国化，西方之理论吸收于我国，为我之滋养也。中西并用尚需创建于当今，兹期待学界同仁赐稿本刊也。是为贺辞。

曹顺庆

创刊贺词三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创刊之际,我愿意写几句话来支持这个新生事物。

为什么要研究“话语”?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的”话语?为什么要研究“当代的”中国话语?简单地说,“话语”就是“实际生活中说的话和说话的活动”。话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发生的,大而言之,语境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话语研究”特别注重话语活动和这些语境的关系。我们过去的研究集中于语言的结构及其演变,研究的对象是多少脱离这些语境的、抽象或概括出来的“语言”。这种研究当然十分重要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忽视实际话语的研究倾向带来负面影响,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当前西方的“话语研究”,据我所知,不仅将话语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而且试图揭示话语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试图用话语来影响历史的进程。这种研究的意义当然已经大大超出了语言学本体研究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不想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这种研究工作不仅有意义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人的话语和话语活动是人类话语和话语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必定符合人类话语和话语活动的一般特性和规律。然而受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人的话语和话语活动又必定带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研究这种特点和特色是中国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话语和话语活动有最切身的体会。当然,有切身的体会不等于有深刻的认识,要对自身的特点和特色有深刻的认识还必须通过比较,拿我们的话语和话语活动跟其他民族的进行比较。要从事比较就要有一个比较的基础,那就是人类话语和话语活动的一般特性和规律。所以研究“中国的”话语和话语活动跟研究人类的话语和话语活动并不矛盾,而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应该互相促进。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继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当代中国的话语和话语方式也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当代的”中国话语不仅是历史上中国话语的继承,而且也部分吸收了西方的话语和话语方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是为话语和话语方式的转变推波助澜。如此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话语现象对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我们当代人最有资格来研究,不要都留给后人去做。今天我们正在提倡“思想解放”,我觉得思想的解放离不开“语言的解放”,特别是话语和话语方式的改变。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的话语里充满了空话和套话,也带有不少“食洋不化”和“言必称希腊”

的话,不把这些旧八股、新八股、土八股、洋八股统统抛弃,要真正解放思想恐怕很难做到,让这样的话语“走出国门”也只会让人见笑。从这个角度说,“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还肩负着为构建当代中国新的话语和话语方式而效力的责任。

最后,我相信《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会办出自己的特色来,同时我也希望能更多地见到一些“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并有充分论证的研究文章。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宏观的考量上,当前更需要的是微观的“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

沈家煊

目 录

- 试论构建中华话语研究体系 ◆ 施旭 · 1
- 亚洲传播研究目前的情况和发展趋向 ◆ 陈国明 · 13
- 东西方语言研究传统——相抵还是互补? ◆ 姜望琪 · 31
- 当代中国话语语料库的建构问题 ◆ 马博森 · 44
- 中西涵化的新语汇的历史功能 ◆ 冯天瑜 · 54
- 网络语言与汉语西化新趋势 ◆ 陈芙 孙元元 郑雪贞 · 61
- 医疗就诊中病人自我诊断的会话分析研究 ◆ 于国栋 · 71
- 企业介绍的话语特征初探 ◆ 张黎 丛永清 · 85
- 军语研究述评 ◆ 周大军 · 101
- 台湾海峡两岸法律话语之比较 ◆ 翁里 张雨蕉 · 113
- 编者按 ◆ · 122
- 征稿启示 ◆ · 124
- 下期内容预告 ◆ · 126

试论构建中华话语研究体系*

◎ 施旭

摘要：尽管西方的“话语分析”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门发展迅速、卓有成效的新学科，且具备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传统未有的独特视角，然而不能、也不应该直接把它套用于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的现实。目前的学术情况是，国际话语研究基本呈西方独白的形式；这不仅抑制了东方相关的学术发展，而且阻碍了人类学术的对话与创新。本文在揭示话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及其后果之后，(1)探索了重构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学术和文化资源；(2)讨论了新范式应该具备的特殊性质以及重构工作应该采取的策略；(3)指出了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可能带来的学术和文化方面的新气象。

关键词：话语分析；多元文化视角；国际对话；学术资源；中国话语问题

一、引言

源于20世纪70年代欧美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突破了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局限，将语言与语境结合起来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研究语言实践活动。比如，它关注篇章结构(如衔接、叙事结构)、言语功能(如言语行为、文体)、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礼貌原则)；有些话语研究还切入了社会生活中的权势、现实构建等问题。目前，它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中一门发展迅速的前沿性学科。话语分析的实践证明，它不仅对社会话语的认识和批评是有效力的，而且对社会科学自身也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现代语言的研究框架主要集中在生活之外的、抽象的音韵、训诂、方言、句法等方面；即使是句法研究也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并没有一套相应的探索中国社会话语的理论、方法系统，更没有实际的研究传统。而中国外语界的话语研究主要还是跟随西方的兴趣，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自己的声音。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必要考虑在中国发展话语研究的工作。

* 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曾以“话语分析的文化转向：试论建立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动因、目标和策略”为题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这里作了一些修改并增加了新的内容。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话语分析毕竟是源于西方的语言研究和文化传统的东西。那么,它是否带有西方的概念、价值观和志趣?中华学人如何创新?研究中国话语是不是应该考虑中华文化语境?中华学术传统里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中西话语学术传统应该如何相互学习、综合创新?

目前,一方面国际环境加速全球化、西方化,而另一方面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为学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文化失语”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如何抓住时机,面对挑战,并争取以平等的文化身份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其实,中国学者近年来已普遍认识到学界脱离文化语境的西化、学舌和失语等问题,及其给中华学术、知识创新和人类文化带来的后果,并开始考虑在全球化的新语境下如何处理东西文化学术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学术的复兴(陈国明,2004;陈平,2006;钱冠连,2002;曹顺庆,2001,2002;申小龙,2001;司马云杰,2001;汪风炎、郑红,2005)。

下文中,我们将首先从东方文化的视角简要剖析主流话语分析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及其后果。接着,我们着重探讨重构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相关传统文化资源和学术资源,目的是为今后的理论和方法构建工作做好铺垫和提供基础资料。然后,我们将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策略,为重构工作作指导。最后,我们将揭示新文化范式可能带来的学术和文化影响。

二、话语和话语分析的概念

要理解什么是话语和话语研究,最好先看话语研究的目的。不同于语言学,话语研究的目的不是要知道一个字、词、句、篇章或一个语音单位的形式或内容,或者其产生的原因、规则、历史,它关心的不是那些从生活事件中抽象化了的范畴以及其中的奥妙,而是要关注、揭示、反思或评价那些借助语言所构建的或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实际发生的、特别是那些具有现实社会文化意义的事件,甚至寻求创造新的言说方式。

“话语”一词,如同“社会”、“心理”、“文化”等等,表达的是整个学科所涵盖的内容,而且其内涵和外延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如同社会学中的“社会”、心理学中的“心理”、文化学中的“文化”等词语,虽然指的是那些人生中实实在在的现象,但同时又是对那些现象的高度概况;“话语”也一样,它是对一组特定的人生现象集合体的概括,因而不是很容易地可以与其他人生现象分开,就像社会与地缘、文化、心理、历史不容易分开一样。

那么,究竟什么是话语?话语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的具体的语言交际事件或这一类现象。如果以日常用语来表述的话,我们可以说话语是指“某人在某种情况下就某种事物向他人进行的言语行为”。换句话说,“话语”是与语境或“语言使用环境”相

关联的语言活动,或者更简单地,是“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活动”。话语研究者一般从功能主义的语言哲学视角理解话语:说话人受一定语境的影响,策略性地运用语言以达到自身的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话语应该理解为更加全面的内容:说话人根据特定的语境(包括听话人)有策略地生成语言活动;反之亦然:听话人根据特定的语境(包括说话人)有策略地理解语言活动。至于如何策略性地生成或理解语言活动则受着特定文化的一定影响。]

在上述宏观理论的观照下,有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方法或体系,它们从不同层面揭示话语的特性、特征或规律。这些具体包括:语言行为理论,会话合作原则,会话分析,礼貌理论,关联理论,社会语言学,民俗交际学,传播学,后殖民话语理论,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心理学,论辩话语研究,叙事学,修辞学,文体学,等等。粗略地总结其中的方法,我们可以概括为:收集文献、访谈资料;观察分析历史、文化语境;分析谁(不)在说话,(没)说什么,如何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为什么这样说而不那样说,别人在如何说,等等。特别是在“如何说”这方面,话语研究者特别显露出与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不同:他们运用语言学(包括各种分支)和与语言学交叉的学科的概念,通过对用词、句法、言语行为、篇章或会话结构、叙事体、论辩和解释结构、修辞(如比喻、讽刺)等等,来揭露、解析并反思个人、机构、社会或文化的问题和矛盾。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官方及媒体都将诸如“独裁”、“极端”等贬义且带有激进色彩的词汇加到萨达姆及其政府身上,布什甚至直接称萨达姆为“魔鬼”,以期将以其为首的伊拉克政府一举消灭;又如,西方商界将第三世界称为“廉价劳动力”;工业文明主张人类的利益高于自然的一切利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关注的话语现象。此外,由于话语本身是多面、纷繁、复杂的,因而对其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是因研究情况、目的而灵活变化的。

“Discourse”的概念在当代中华文化里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更没有形成与西方话语分析相对应的研究学科。既然西方的话语分析已被证明为十分有意义的前沿社会科学,而且可能给中华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带来新视角、新概念和新方法,因此开启建立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也是必要的。

三、对主流话语研究的文化反思

在本文中,我们先对主流话语研究的一分子——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作一文化反思。为此,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种话语现象(具有特定、具体的说话人、内容、方式、环境、效果等等)。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该学科的学者在叙述话语研究的定义、概念、理论、方法时,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它们具有一般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可以不分时空地应用;没有哪一种经典著作或教科书明确地表示,它们仅仅限于英文或

欧美文化。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话语通过跨国垄断出版公司、大众传媒、国际讲学和教育、国际会议以及其他以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为基础的手段,不断普及和扩散到世界各角落,成为强势的全球性学术话语(作为一种文化产业,这种话语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东方文化的一些学者接受、认同、翻译、介绍、再介绍批判话语分析,甚至把它运用于本土文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他们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渲染、巩固了该学术话语的文化普遍性,使其全球性更为壮观。

但是,如果我们从该话语的民族、文化、历史等语境情况去分析,便会发现它并非泛世或具有文化普遍意义的。比如,理论和方法创造者或其代言人绝大多数是男性、白人;该话语讨论的事件、现象、问题主要出现在(英美等)西方社会;该话语所反映的志趣、视角也只局限于西方文化。下面,我们就聚焦于该话语的三个方面来透视其文化的特殊性。

(一) 个人主义

话语分析的主要语言哲学基础是欧洲的功能语言学以及历史更加悠久的修辞学。学者们普遍认为,受社会结构(包括社会意识)制约人们的行为(包括语言活动)的影响,富有私欲、善于算计的人类操纵语言,以达到个体或群体的自我目的。换言之,语言是人们用于获得个人自我目的的工具。这种文化观、人生观不易使人看到语言的社会性这个本质特征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他人的关照。这种欧洲功能主义的语言观,在更深、更广的文化、道德精神方面,又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所崇尚的个人主义之上的。相反,中国传统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主要是建立和保持和谐社会关系的工具,是“立德”的手段。这与中华文化所崇尚的“仁”、“礼”、“和谐”和社会行动的政治目标(如“治国、平天下”)等最高社会行为准则与终极关怀形成很大的反差。

(二) 二元对立

受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话语研究者往往以二元对立或分一为二的方法看事物,并在两极化了的事物之间寻求一种简单、机械的因果关系。因此话语分析工作者往往将话语现象分裂成“语言本体”与“语境”、“语言”与“社会/心理认知”、“言者”与“听者”等两极关系,以求对其中一方面或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但问题在于,这种方式可能导致见树不见林、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忽视事物的错综复杂性、辩证依存关系以及事物不断变化的性质。而这种思维方式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辩证思维和整体观相反。根据中国的这种思想,上述关系必须结合考虑,以求全面、深入的认识。

(三) 语言中心论

与上述思维方法紧密相关,话语理论家往往认为可以观察的语言形式才是意义的真

正载体。这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因此,大量话语分析实践的事实表明,话语研究的中心是语言的形式和内容,语境至多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中轻描淡写一下,具体的文化语境往往是被忽略的。Fairclough (1992)试图通过建立“话语和社会”的反向动力关系(“话语改变社会结构”)来克服二元对立的问题,但终究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及其后果。因为在具体的分析层面,他仍然保留了“不可消解的社会条件”,却没有分析后者的理论方法系统,因而研究实践只能聚焦在语言形式和内容上。然而,这正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言不尽意”的语言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华学术中,因为“言有尽而意无穷”,学者讲求超越语言形式,通过“妙悟”、“虚静”,以获得“意境”、“神韵”、“道”等等。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性话语的无限膨胀或“自由竞争”,起码导致了三方面的后果:一是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挤、抑制了第三世界、东方学术的自我发现、发展和创造;二是它因此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合作、创新的可能性和机会,终将使人类的知识更加趋于单一、贫乏;三是这种饱蘸西方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志趣的话语体系,使已经不平等的人类文化关系及其内在的偏见和无知变得更加持久、巩固。

四、重建中华文化话语研究范式的基础

(一) 中华文化话语的现实

当代中华话语,如同当代东方话语中的其他变体,虽然与西方话语有共性和联系,但它有自己的本质特征:第一,如同以亚非拉地区为代表的东方话语,中华文化话语的主体,广大的中华民族大众,有着受近代西方列强凌辱的集体历史记忆。这种关于殖民统治和压迫经历以及与之相联的认知和情感是当代中国话语语境的重要部分,与后者形成特殊的复杂关系。第二,中华文化话语在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占弱势地位。这种境地和国际社会关系也是当代中国话语语境的重要部分,同样与后者形成特殊的复杂关系。第三,当代中华文化话语本身有其特别关注的事物和问题、特殊的看世界的方法和立场、特殊的言说方式。这种文化话语的特性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理论和方法所能涵盖和处理的。

(二) 中华文化话语的文化资源

除中华文化话语本体(语言使用+语境)之外,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观(“哲学”)是我们重建当代中华文化话语研究新范式的又一重要基础条件或资源。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人生观。它们不仅有别于而且超越了西方的哲学框架,所以我们应该对此加以利用,以重构有文化特色的、更加完善的科学研

究体系。第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克服了西方文化典型的“原子观”的局限,可以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事物的全貌。如果把它运用到话语理论的构建中去,能使我们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语言使用与语境、研究结论与社会责任、东西方文化等相关因素结合起来,开拓更加全面的话语理论。第二,与天人合一一脉相承的、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又一基石的“辩证思维”模式,克服了西方“二元对立”的缺陷,帮助我们看到事物之间的内在的、相辅相成的、运动变化的复杂关系。如果把它运用到话语理论的构建中去,能帮助我们揭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语言使用与语境、研究结论与社会责任、东西方文化等事物的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从而提出更加丰富的话语理论。第三,中华传统文化讲求人应该获得“仁”的完美境界(《论语》里提到109次)以及社会活动应该达到“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最高层次(《礼记·大学》)。这些人生最高原则或者道德标准同时又与中华文化的社会“和谐”观完全吻合。如果我们将这种为人处世的最高理想与西方文化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道德观相比,便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利他/她”、“利社会”的集体主义的、当代社会所需要的特性和本质。如果将这一中华民族美德纳入中华话语理论中,我们不仅可以拓宽目前的以言说者为中心的理论倾向,而且在评价人们话语活动上多了一条重要的伦理标准。

(三) 中华文化话语的学术资源

中华文化除了具备上述宏大的文化气质外,还有一系列关于语言交际的精辟的学术思想。其中有些思想,特别是儒家语言观,由于它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在中华文化的语言实践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要重构中华文化话语的理论和方法也必须对这些语言学术思想和语言道德思想进行挖掘、重新解释和再创造。我们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分为三大类:(1)关于话语意义生成和理解的理论,(2)关于话语的范畴,(3)关于话语生成和理解的道德标准。具体地说:

第一,独特的话语意义生成和理解理论:“言不尽意”。中华文化关于语言交际的核心理论思想当属“言不尽意”(《周易·系辞》)。《道德经》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那就是说“道”是不可言说的。这一说法同样表达了意义的不可言说性。但同时它也表达了语言问题的另一面:语言必须试图表达意义(曹顺庆,2001)。庄子也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种“言不尽意”(《周易·系辞》)、“言有尽而意无穷”(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的思想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篇:“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和传承。

由于言与意、言与道的这种矛盾,在话语生成和理解方面,中华文化还发展了相应的策略和规则(曹顺庆,2001),如“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以少总多”(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虚实相生”(虚境指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的空间,通过实境来

实现；实境要在虚境的统摄下来加工；两者结合成为意境独特的结构方式）、“依经立义”（《文心雕龙·辨骚》：“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顿悟”（原在佛学里指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佛法的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虚静”（原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如《道德经》、《管子》、《庄子》中，指人在认识外界事物时的一种静观的精神境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进一步将“虚静”作为使作者更好地投入艺术构思和审美创造的境界来定义）。

第二，独特的话语范畴：“意境”、“风骨”、“神韵”、“文气”，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文艺理论尤其是经典诗学中独特的话语范畴。比如，“意境”最早见于王昌龄的《诗格》，它不是指一般的知性思维或心意情感，而是指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是语言所表达的“道”的“意义”。因为强调言外之意，它本质上是与“道”相同的。“风骨”指对文学作品在内容（或“情”）和文辞方面的整体的美学规范或要求。“神韵”指一种理想的、韵味深远、天生化成、体现出清空淡远的艺术境界，通俗地说就是传神或有味。“文气”既是描写作家的气质、个性，又是指作家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文气说强调创作主体心理结构的先天性、稳定性和个性差异。

第三，独特的话语生成和理解的道德标准：言德辩证关系。上面已经提到，儒家传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主流文化，因此要认识、掌握当代中国话语不能不考虑这一传统。从逻辑上说，其话语观更是我们应该掌握的。我们认为，儒家的话语观是一种将“立德”作为话语首要原则的伦理性（ethical）概念，这体现在《左传》、《论语》、《吕氏春秋》等一系列著作中。儒家思想的核心经典《论语》中提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论语·颜渊》）

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学而》）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从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出几条隐含的预设：一是语言的本质是有道德性的，语言不能脱离道德性而独立存在；二是说话者应该讲求道德；三是听话者也应该讲求道德。因此，儒家的话语观是以“立德”为出发点的。

儒家的语言道德观还有一些具体的形式和内容，它们表现在一系列具体的话语关系上：

第一，在言—人关系上，儒家认为言语行为具有道德的价值，而且这种语言活动与说话者的气质特性有关，因而人们可以对言语和言说者进行价值判断。所以，儒家提倡说话者慎言。但儒家同时也认为，因为言语又具有本身的特性，所以听话者也应该谨慎：